

社会变迁与初婚影响因素的变化*

於嘉 谢宇

摘要:通过分析2003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我国城镇居民初婚影响因素近几十年来的变化。通过世代比较,本文发现,随着我国消费模式的变化,男性经济条件对初婚的影响作用逐渐增加。此外,国企改革使得体制内男性与女性职工在婚姻市场的优势逐渐下降。通过将个人层面信息与市级住房价格数据的匹配,本研究进一步发现房价的上升对我国城镇男女进入婚姻的影响通过教育这一中介机制而产生作用,个人教育对初婚的影响随着不同地区间房价的差异而显现出不同的效应。在房价较高的地区,较高的教育会增加进入婚姻的概率,而在房价较低的地区,教育主要起到推迟进入婚姻的作用。总的来说,本文的结果表明了初婚影响因素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

关键词: 社会变迁 初婚 影响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无论基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研究均显示出初婚时间对生育、教育、工作和职业的影响(如 Coale & Treadway, 1986; Casterline, 1994; Rosero-Bixby, 1996)。而除了家庭结构、性别关系等与家庭相关的方面,婚姻往往还反映出—个社会的变迁(Raymo, 2003; Yabiku, 2004; Nobles & Buttenheim, 2008)。由此,了解婚姻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变迁对于理解—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变化就具有重大意义。

近些年来,世界各地的人口数据均表明男性与女性的初婚年龄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也引发了学者们对初婚影响因素的探索。根据不同的研究取向,以往对初婚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整体

* 作者特别感谢陈婷、胡婧炜、穆峥、靳永爱、巫锡炜等人对本文的建议和帮助。文责自负。

层面解释影响平均初婚年龄和结婚率的宏观因素，而另一类则在个体层次解释影响人们进入婚姻的个人特征。那些关注初婚年龄整体层面变化趋势的研究认为，女性经济的逐渐独立是她们推迟初婚年龄的主要原因，而地区的不平等水平、福利政策等因素也会对整体层面的结婚率与初婚年龄产生影响（Coughlin & Drewianka, 2011）。但是这些整体层面婚龄和结婚率的研究往往难以解释在同一个时期、同一社会中婚姻形成的个体性行为，因而很多研究者将关注转向了探讨个体层面初婚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大量个体层面的经验研究证实，年龄、教育、就业等因素均会对个人进入婚姻的可能性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一些学者更进一步发现，这些初婚影响因素的作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例如男女双方良好的经济基础，尤其是拥有稳定的工作对于美国民众婚姻的形成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Sweeney, 2002）。然而，过去大部分有关个体层面初婚的研究只观察到这些影响因素作用的变化，却并不能解释这些变化是由哪些特定的社会变迁导致的。因此，尚无研究将个人的特征与宏观社会的变化相结合以解释影响初婚因素的社会变迁，这是当前初婚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缺憾。

本研究立足于中国这样一个正经历剧烈变迁的社会，试图弥补上述以往初婚研究的不足。如我们所知，我国近几十年来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于我国居民的婚姻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产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个人因素在婚姻形成过程中越发重要。我国的传统文化对婚姻与家庭十分重视，以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均较早且普遍地进入婚姻，这使得个人特征对于人们能否进入婚姻的影响十分有限。然而，这一传统价值观在市场化 and 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受到很大的冲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改变，我国居民开始更加选择性地进入婚姻，对婚姻匹配的要求越来越高，进入婚姻更晚，这就造成我国结婚率的下降和初婚年龄差异性的增加，而个人因素在婚姻形成过程中也就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煜、徐安琪，2004）。另一方面，伴随我国近些年来的一些转型与改革，个人因素对婚姻形成的影响效应也随之变化。首先，居民收入的提高与消费模式的转变使得人们对婚姻的经济基础越来越重视，因此经济潜力，特别是男性的经济潜力，越来越成为人们婚姻形成的必要条件（Mu & Xie, 2011）。其次，市场化带来的国企改革导致体制内工作的优势逐渐下降，这使得我国城镇居民的一些个体因素，如工作单位等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样产生变化。此外，

改革不仅使得这些影响初婚的个人因素的效应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也使得这些影响因素的效应在不同的地区有所差别。我国近年来推进的住房改革除了引起城市房价不断上涨外，也导致地区间房价的不平衡更加凸显，而这可能会导致个人的经济潜力等因素对初婚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体现。因此，基于我国近些年来市场转型与发展，本文除了与以往研究一样检验就业、教育等因素对初婚的影响之外，还试图考察这些初婚影响因素的作用如何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改变。

综上，利用 2003 年与 2008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研究运用事件史的分析方法，主要试图考察三个问题：第一，哪些因素会影响我国男性与女性的初婚年龄；第二，这些影响因素的效应近几十年来是否产生了变化；第三，哪些制度与政策的变迁能够解释这些影响因素的变化。

二、理论框架与文献回顾

在社会科学文献中，帕森斯的性别角色分工理论被长期用于解释婚姻的形成 (Parsons, 1949)。近几十年来，贝克以及其他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阐释 (Becker, 1973, 1974, 1991)，逐渐发展出“专业化与交换 (specialization and trading)”模型。这一模型强调人们之所以能够从婚姻中获益是因为夫妻双方相互依赖，而这正基于性别分工，即男性擅长在劳动力市场工作，而女性则专注于家庭内部事务。因此，只有当男女有着不同的专业分工时双方从婚姻中的收益才能最大化。此外，这一理论也假设男女双方在婚姻市场上在互相进行交换，只有到双方都认为他们能够从婚姻中获益时婚姻才能够形成。在美国，随着女性在二战以后越来越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男女双方的专业分工越来越不明显。根据这一理论的解释，由于女性在婚姻中获益减少，因而 1960 年代后美国女性结婚率逐渐降低，平均初婚年龄也逐渐增高 (Preston & Richards, 1975; Goldscheider & Waite, 1986)。

然而，对这一理论的经验性证据并不充分。虽然一些学者基于整体层面的数据发现了女性的经济条件（例如教育与收入）与结婚率的负相关关系 (Preston & Richards, 1975; White, 1981; Lichter et al.,

1991; McLanahan & Casper, 1995; Cready et al., 1997; Coughlin & Drewianka, 2011), 但是, 另一些学者利用个体层面事件史数据则发现女性的经济潜力能够提高她们结婚的可能性 (Cherlin, 1980; Waite & Spitze, 1981; Goldscheider & Waite, 1986; Lichter et al., 1992; Oppenheimer & Lew, 1995; Thornton et al., 2007)。奥本海默总结了以往的理论争议和实证发现, 提出了“婚姻寻找 (marriage search)”理论 (Oppenheimer, 1988)。这一理论强调了经济对于女性进入婚姻的重要性。奥本海默认为, 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经济条件本身在婚姻市场中有了更大的功能。传统社会中女性并不需要负担家庭收入, 因而在形成婚姻时只有男性的经济状况需要被评估, 但是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市场, 而且物价上涨使得男性的个人收入往往并不能够承担整个家庭的开销时, 男性在择偶时就会更多地考虑女性的经济条件。一系列利用世代比较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理论, 他们发现女性的经济潜力在婚姻形成中作用越来越重要 (Qian & Preston, 1993; Goldstein & Kenney, 2001; Lichter et al., 2002; Sweeney, 2002)。

相比于女性, 对于男性初婚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则较为一致。无论是贝克还是奥本海默的理论均认为, 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将增加他们结婚的机率。而无论利用截面数据还是跟踪数据, 研究者均观察到男性的经济潜力与进入婚姻有着正向的关系 (如 MacDonald & Rindfuss, 1981; Goldscheider & Waite, 1986; Sweeney, 2002; Xie et al. 2003)。但是这种正相关的幅度是否在变化却较少受到关注。一些学者认为男女双方在婚姻中经济角色越来越接近主要是由女性的变化带动的, 男性的经济角色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

虽然上述提到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了初婚的影响因素及变迁, 但它们却面临两个非常严重的局限性。第一, 这些研究还没有建立起特定的社会变迁与初婚影响因素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过去的研究中, 妇女的劳动参与率 and 经济发展是常常被用来解释女性在婚姻中经济角色变化的宏观因素, 但这些宏观因素与个体层面的婚姻行为是否有着直接的关系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检验。因此, 本文对有关初婚研究的第一个贡献就在于寻找并识别改变男女初婚影响因素的特定社会变迁。第二, 以往对于初婚影响因素变迁的研究较少关注发展中国家。学者们基于稳定的西方社会所做的研究往往并不能观察到较大的代际变迁。尤其是对于男性, 以往基于西方国家的研究几乎没有观察到其初婚影响因素的变化。而我国自建国以来经

历了几次非常大的社会变迁，这一背景正好能够帮助我们观察到较为显著的初婚影响因素的代际变化。除此之外，我国一些制度的转型，如私有化和国企改革，也能帮助我们观察到制度层面的变化是如何具体地影响到个人的婚姻行为。因此，本文针对我国这样一个经历了快速和巨大社会经济变迁的国家展开研究，其目标除了帮助理解我国的初婚影响因素和其变化之外，也试图为有关婚姻形成的文献提供更多的启示和经验证据。

三、我国的社会背景

在报告实证工作之前，本文将先对我国近几十年的整体变迁和特定制度变迁的状况进行介绍。自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经济方面。自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不仅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模式的变化，也逐渐降低了建国初期和文革期间国有部门的优势，并促进了房屋的改革。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消费模式是以经济平均主义为特点的（Parish, 1981, 1984）。城市居民的消费往往由政府分配决定。除了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必须使用粮票等票据换取外，住房、自行车等“奢侈品”更是需要根据有限的配额进行分配，民众只有较少的消费自主权。然而，这种平均主义的消费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被打破（Tang & Parish, 2000），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起了较大的变化。消费主义和物质文化的兴起使得我国年轻的一代对生活有了更高的物质需求。而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婚姻的经济基础也会发生变化，经济条件在婚姻市场中也可能比以前更为重要。因此，本研究将考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个人的经济潜力在婚姻形成过程中作用的变化。

在我国，个人所在的单位与其收入和福利等方面高度相关，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大量经验研究证实（Bian et al., 1997; Bian, 2002; Xie & Wu, 2008; Xie et al., 2009）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拥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往往意味着很多方面的优势，例如物资供给与住房安排。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调整生产机制和再分配制度、加快经济发展，我国开始对国企进行改革。1978 年到 1992 年间，我国开始引入市场调节机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将企业经营的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

益挂钩。在此过程中，国企内部职工的收入出现了差异，一些效益较差国企的职工收入有所下降。此外，体制外工作的收入开始有了大幅的增加（Wu, 2002）。1992年以后，遵循“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的改革思路，国企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这一举措造成了九十年代末期大量国企职工的下岗，同时也昭示着体制内工作优势的下降。如前所述，工作是影响初婚的重要因素，随着体制内工作的经济优势下降，体制内职工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也可能随之下降，因而我们有必要检验国企改革这一制度转型对我国个人的婚姻形成过程产生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的住房都是政府当作福利来提供的。改革开放以前，几乎所有城市居民都可以以很低的租金（家庭收入的1%-2%）获得由单位兴建和分配的公共住房（Bian et al., 1997; Logan & Bian, 1993; Whyte & Parish, 1984）。虽然住房的大小、条件与单位的所有制和行政等级密切相关（Bian, 1994; Walder, 1986, 1992），但总体来说，住房改革之前我国居民的住房不平等程度较低。不过由于这一住房再分配制度也存在许多弊端（Tang & Parish, 2000），例如妨碍劳动力合理流动等，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后便开始对住房政策进行调整，其中影响最大的政策就是房屋的商业化与私有化。1998年，国务院2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规定，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这正式宣告了我国将住房作为集体福利进行分配这一存在近50年的住房制度的终结（Zhu, 2000）。自此之后我国的商品房市场开始迅速发展，房屋价格也一路攀升，全国平均房价从1991年的每平方米315元上涨至2008年的2528元^①。在我国当前社会，拥有一套住房往往被认为是夫妻结婚的必要条件，然而住房改革带来的高房价则给年轻一代进入婚姻增加了压力。不断上涨的房价可能使得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年轻人很难找到配偶，同时也可能使得那些能够负担一套房子的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年轻人变得更有吸引力。由于在我国地区间的房屋价格相差很大，这一空间上的差异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考察房屋改革对个人婚姻行为的影响，即相同的个人条件是否在房价不同地区的婚姻市场具有不同的吸引力。

综上，得益于我国近些年来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变

① 已按照2008年价格调整通货膨胀率。

迁，本文在检验我国初婚的影响因素之外，更试图探索消费模式的变化、国企改革和住房改革这三个制度层面上的变迁会使得个人层面初婚影响因素的作用产生怎样的变化。

四、数据与测量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 2003 年和 2008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SSS2003 和 CGSS2008）。CGSS2003 和 CGSS2008 的样本均对全国城镇地区（除西藏）的 18 岁以上人口具有代表性，采用的是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式^①，其中 CGSS2003 城镇样本量为 5894 人，CGSS2008 的城镇样本量为 3982 人。本研究利用两次调查的结果构造出合并截面数据，两次调查的全部城镇样本均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与以往研究类似，本文将男性与女性分为两个样本分别研究影响其初婚的因素。由于两次调查均对受访者的教育史、工作史、婚姻和家庭状况收集了丰富的信息，因此本文可以利用这些回溯性的信息构造出非常详细的人年（person-year）记录数据^②。

（二）变量和方法

本文利用 logit 模型来估计进入婚姻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这一方法可以同时考虑时间不变与时间可变的初婚影响变量，并且避免了比例风险（proportional hazards）这一假设（Allison, 1995）。本文的因变量为一个表示受访者是否在给定的两年之间进入婚姻的二分变量，而所有时间可变的自变量在每个时间间隔中都是不变的。所有的数据都被构造成人年的记录形式。受访者 15 岁时的时间被规定为进入婚姻风险起始年。对在风险数据集中未经历初婚的样本，从风险起始年开始一直观察到其接受调查时的年龄；对经历过初婚的样本，初婚发生即终止观察。

为了研究社会变迁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类似，我们首先比较了不同世代（cohort）的初婚影响因素。如莱德所述，“如果社会变化发生

① CGSS2003 仅调查了全国城镇居民，CGSS2008 调查了全国城镇与农村居民，由于本研究关注中国城镇居民的初婚状况，因而仅利用了 CGSS2008 的城镇样本。

② 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在文中报告描述性统计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取。

了，那么它将使得世代之间更加不同，而比较他们的生命轨迹即可以考察出社会变迁”（Ryder, 1965）。因此，本文将样本分为3个出生同期群：早期出生世代（出生于1960年及以前），这些人大部分将在改革开放之前（1978年前）面临进入初婚的风险；中期出生世代（出生于1961-1974年间），这些人大部分将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1年）面临进入初婚的风险；晚期出生世代（出生于1975年及之后），这些人大部分将在晚期出生——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城市进入全面改革的那段时期——面临进入初婚的风险。本文将利用同样的模型对这三个世代进行分析，并比较相同解释变量在不同世代间效应的差别。

本文的自变量包含两类：个体层面变量与情境（contextual）层面变量。在个体层面变量中，我们首先纳入了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因素：就业与教育。本文用受访者是否有工作的二分变量（有工作=1）来衡量其是否转换为成年人的经济角色并拥有较稳定的经济条件对进入初婚的影响。由于CGSS2003与CGSS2008询问了受访者详细的工作史，因而这一变量为时间可变变量。如前文所述，随着消费模式的变迁，人们往往更重视婚姻的经济基础，因而我们预期就业的正向作用将在世代间逐渐增加。受访者所在单位的性质也被作为一个解释变量纳入本文的分析中。根据受访者的工作史，我们将受访者工作单位所有制构造成为一个时间可变的二分变量（国有单位=1）。而由于国企改革和市场化的推进，我们预计受访者在体制内工作的优势将在世代间逐渐下降。

本文利用受访者的教育年限来测量其教育水平，类似地，基于受访者的教育史，受访者的教育年限也为时间可变变量。但与就业状态不同的是，教育往往含有双向的作用。一方面，高教育的男女往往可能有更好的经济潜力，从而促进其进入婚姻；另一方面，高教育的男女由于经济独立性较高，往往能够承担更长时间的婚姻匹配过程，此时教育反而起到了推迟初婚的作用。除此之外，一些研究发现，由于东亚女性有向上通婚的传统，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高教育的女性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找到与之教育程度相当或比之更高的男性。因此，我们在考察和解释教育对婚姻形成的作用时往往需要更加谨慎。

除了主要的解释变量之外，我们还纳入了年龄、是否在校、户口、民族和父亲教育程度这些个体层面的时间可变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的

研究，年龄与对进入初婚的影响往往并非线性的（Thornton et al., 2007），因此本文将年龄作为样条函数（spline function）纳入研究，以估计年龄增长在不同年龄区间内具有的不同效应。由于男性与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不同，因此我们对男女使用不同的年龄样条模型（specification）：男性年龄分为 15-21 岁，22 岁-25 岁，26 岁-30 岁，31 岁以上；女性年龄分为 15-19 岁，20 岁-25 岁，26 岁-30 岁，31 岁以上。除了对教育累积的测量之外，本文还纳入了一个虚拟变量控制受访者是否是在校学生（在校=1），这是因为以往研究表明，较之于毕业生结婚，在校学生结婚往往需要克服更多学业、家庭方面的困难（Thornton et al., 1995）。虽然本文的样本限定为受访时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但是由于一部分受访者经历了户口转换，因为本文也加入了户口状态这一时间可变二分变量（城镇户口=1）。此外，本文还控制了民族与父亲教育程度这两个时间不变变量。一些西方国家的研究发现不同种族群体往往在进入初婚上有着不同的模式，因而本文也将受访者是否为少数民族这一时间不变虚拟变量加入研究（少数民族=1）。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则用来衡量受访者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共分为四类：小学及小学以下（参照组），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

除上述个体层面的变量外，本文还纳入了房价这一情境层面的变量。利用我国 1990 年至 2001 年的《中国城市建筑统计年鉴》和 2002 年至 2008 年的《中国地区经济统计年鉴》，我们计算出了我国所有地级市在 1991-2008 年间的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平均房价^①，并将这些房价与受访者人年记录的所在城市进行匹配^②。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能观察到地区间房价的差异对进入初婚产生的主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房价与个人经济条件的交互项，我们也能观察到房价是如何影响个人经济条件在婚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最终考察我国住房改革这一制度变迁是如何作用于个体婚姻行为的。

五、结果与分析

① 所有年份的房价均根据 2008 年调整了通货膨胀率。

② 由于 CGSS 中并没有包含受访者详细的移民史，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受访者被调查时居住地的房价进行回顾性匹配，这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测量误差。我们希望在后续的研究中能够克服这一缺陷，将移民因素考虑到研究中。

（一）世代比较结果

本文首先检验了男性与女性初婚影响因素及其在世代间的差别。表 1 和表 2 中的三列分别显示对男性和女性早期出生世代、中期出生世代和晚期出生世代进入初婚的多元分析，其中包括了除房价外的所有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我们从表 1 中可以看到，在劳动力市场拥有一份工作对男性进入初婚有着积极的影响，并且其效应在世代间逐渐增加。对于早期出生世代，就业对男性进入初婚的正影响并不显著，然而对于中期出生世代和晚期出生世代，拥有一份工作将分别带来初婚几率（odds）67%和 621%的增加。这印证了本文提出的由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变化而使得人们对男性经济条件更加重视这一观点。而表 2 显示女性就业对初婚的影响显然不同。拥有工作对早期出生世代的女性具有负面的影响，其初婚几率相比没有工作的女性低了 17.4%，而是否工作对中期出生和晚期出生女性进入初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侧面反映出，随着我国男女平等程度的提高，女性不再面临工作与家庭的冲突。

表 1 对我国不同世代城镇男性初婚影响因素的多元分析

	早期出生世代 (1960年及以前出生)	中期出生世代 (1961-1974年出生)	晚期出生世代 (1975年及之后出生)
是否有工作（有工作=1）	.138 (.113)	.510*** (.178)	1.975*** (.486)
工作单位所有制（国有=1）	.307*** (.077)	.229** (.096)	-.092 (.148)
教育年限	-.016 (.011)	-.052*** (.016)	-.101*** (.027)
年龄（样条函数）			
15-21岁	.431*** (.036)	.647*** (.0519)	.671*** (.0931)
22-25岁	.365*** (.029)	.351*** (.034)	.483*** (.054)
26-30岁	.00284 (.032)	-.067 (.049)	.150* (.079)
31岁以上	-.078***	.202**	.223

	(.019)	(.082)	(.296)
是否在校学生(在校=1)	-.487***	-.335**	-.414*
	(.129)	(.142)	(.225)
户口(城镇户口=1)	-.315***	-.368***	-.0883
	(.095)	(.116)	(.170)
民族(少数民族=1)	.202	-.329*	-.272
	(.164)	(.182)	(.304)
父亲教育水平			
(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158	-.184	.169
	(.120)	(.131)	(.155)
高中/中专	-.263	-.116	-.108
	(.166)	(.122)	(.187)
大专及以上	-.353	-.323*	-.135
	(.195)	(.187)	(.271)
常数项	-11.82***	-16.02***	-17.87***
	(.746)	(1.091)	(2.004)
N	15107	11068	5575

注：(1) 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2) * p < 0.1, ** p < 0.05, *** p < 0.01(双尾检验)。

表 2 对我国不同世代城镇女性初婚影响因素的多元分析

	早期出生世代 (1960年及以前出生)	中期出生世代 (1961-1974年出生)	晚期出生世代 (1975年及以后出生)
是否有工作(有工作=1)	-.191**	-.024	.143
	(.086)	(.132)	(.277)
工作单位所有制(国有=1)	.209**	.174*	-.022
	(.086)	(.094)	(.142)
教育年限	-.082***	-.059***	-.102***
	(.00979)	(.014)	(.021)
年龄(样条函数)			
15-19岁	.455***	.725***	.667***

	(.036)	(.064)	(.094)
20-25岁	.265***	.360***	.431***
	(.020)	(.023)	(.034)
26-30岁	-.066	-.197***	-.107
	(.050)	(.060)	(.117)
31岁以上	-.124***	.086	.796
	(.031)	(.086)	(.633)
是否在校学生(在校=1)	-1.000***	-.548***	-1.461***
	(.153)	(.137)	(.229)
户口(城镇户口=1)	.080	.125	.308**
	(.0822)	(.096)	(.133)
民族(少数民族=1)	.207	-.111	.239
	(.146)	(.152)	(.200)
父亲教育水平			
(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209	-.038	.044
	(.128)	(.102)	(.134)
高中/中专	-.472***	-.232	.119
	(.161)	(.153)	(.158)
大专及以上	-.444**	-.213	-.250
	(.205)	(.164)	(.295)
常数项	-10.52***	-16.33***	-14.96***
	(.667)	(1.234)	(1.802)
N	12014	10676	6357

注：(1) 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2)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双尾检验)。

表1中对教育的分析显示，与以往基于欧美国家的研究不同，教育对于我国城市男性来说主要具有延迟进入初婚的效应，即高教育的男性愿意且能够承担更长时间的择偶过程。对我国城镇男性来说，教育程度的增加并不显著地影响早期出生世代进入初婚，但对于中期出生和晚期出生世代来说，教育每增加1年将会分别带来5.1%和9.6%结婚几率的下降。与男性类似，如表2所示，教育对于我国城市女性同样具有延迟初婚的效应，教育每增加1年会对三个世代的城镇女性

分别带来 7.9%、5.7%和 9.7%初婚几率的下降。这一结果与对日本女性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 (Raymo, 2003), 这也反映出东亚国家与欧美国家婚姻形成过程的差别。在欧美社会, 人们的初婚年龄普遍较晚且差异较大。此外, 从中世纪以来婚姻便是其社会分层的一种结果 (Thornton et al., 2007)。地位较低出身较差的民众, 尤其是男性往往很难进入婚姻, 这就使得教育这一影响着未来经济潜力的因素成为婚姻市场中十分具有竞争力的资源, 从而造成欧美社会中教育对婚姻形成的促进作用。而在东亚地区, 由于传统文化对家庭非常重视, 因而无论个人条件的好坏, 人们均能普遍且选择尽早进入婚姻 (Thornton & Lin, 1994)。这样一来, 由于接受教育时间较长的人往往需要在完成学业后才能进入婚姻, 从而使得教育对婚姻产生了推迟的作用。由此本文的结果也为探讨欧美与亚洲国家初婚模式的不同提供了一定的实证证据。

通过比较表 1 中不同的世代, 我们不难看出, 我国城镇男性在体制内工作的优势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对于早期出生世代, 相比于体制外, 在体制内工作会给结婚几率带来 35.9%的显著增加, 在中期出生世代中这一优势下降为 25.7%, 而在晚期出生世代中这一优势则不再存在。表 2 中我国城镇女性也显示出相同的趋势。对于早期出生世代而言, 相比体制外工作的女性, 体制内工作的女性结婚几率高出 23.2%, 这一优势在中期出生世代中下降为 19.0%, 而在晚期出生世代中这一优势也不再存在。这一结果明显地反映出国企改革和市场化对体制内职工进入婚姻优势的冲击。

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首先, 对三个世代的城镇男性而言, 其年龄的增长对于进入婚姻的促进效应逐渐下降。在 15-21 岁期间, 年龄每增长 1 岁对三个世代的结婚几率分别带来 53.9%、91.0%和 95.6%的增加; 在 22-25 岁期间, 年龄每增长 1 岁会给三个世代的结婚几率带来的增加较少, 分别为 44.1%, 42.0%和 62.1%; 在 26-30 岁期间, 年龄的增加仅对晚期出生世代有显著的影响, 年龄每增长 1 岁会带来 16.1%的结婚几率的增加; 而在 31 岁以上, 年龄每增长 1 岁对早期和中期出生世代会分别带来 7.5%的结婚几率的减小和 22.4%的结婚几率的增加, 对晚期出生世代则没有显著的影响。对女性的分析结果与男性类似。在 15-21 岁期间, 女性年龄每增加 1 岁会对三个世代结婚几率分别带来 57.6%、106.5%和 94.8%的上升; 在 22-25 岁期间, 年龄每增加 1 岁会对三个世代结婚几率的正向影响有所下降,

分别为 30.3%、43.3%和 53.9%；在 26-30 岁期间，女性年龄每增长 1 岁仅会显著地造成中期出生世代的结婚几率下降 17.9%；而在 31 岁以上，女性年龄每增长 1 岁仅会显著地造成早期出生世代的结婚几率下降 11.7%。上述我国城镇男女年龄在不同世代间效应模式的差别也反映出，随着我国现代化的推进和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对晚婚抱有更宽容的态度。

从表 1 与表 2 中可以看出，在校学生这一身份对男性和女性的婚姻形成均有负向的影响，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非常一致 (Thornton et al., 2007)。我们的结果表明，在校学生身份对城镇男性的三个世代会分别降低其 38.6%、28.5%和 33.9%的结婚几率，而女性的在校学生身份会对其三个世代的结婚几率分别造成 63.2%、42.2%和 76.8%的下降。这一结果也表明，在校女性想要进入婚姻往往需要克服更多困难，侧面体现出女性在学期间结婚需要付出更高的机会成本。

对于早期出生和中期出生的男性世代，相比农村户口男性，城市户口男性的结婚几率要低 27.0%和 30.8%。这是因为农村居民习惯于早婚早育因而较早地进入婚姻。对于晚期出生的男性，农村户口并不会对进入初婚造成显著的影响，这也可能反映出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在婚姻观念上的逐渐接近。对城镇女性来说，户口对于早期出生和中期出生世代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城市户口仅对晚期出生女性世代有着正向作用，她们比农村户口女性的结婚几率高出 36.1%。这可能与另一方对女性经济条件越来越重视有关，即随着消费模式的变化，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户口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可能逐渐变得更有吸引力。是否为少数民族对于我国城镇男性与女性的婚姻形成均没有显著的影响。父亲的教育程度对我国城镇男性进入初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对城镇女性的影响也仅限于早期出生世代，对这一世代而言，与父亲拥有小学教育程度的受访者相比，父亲拥有高中学历和大学学历的受访者进入婚姻的几率分别低 37.6%和 35.9%。

(二) 房价的影响

通过上文对世代的比较我们已经检验了消费模式的变化和国企改革对我国城镇居民初婚决定因素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考察住房改革这一制度性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到我国城镇居民婚姻形成的过程。

由于我国的商品房市场是在 1980 年代末才开始逐渐兴起的，我们只能搜集到 1990 年以后的房屋价格。为了将市级的住房价格匹配

到受访者全部的人年数据记录上，我们将样本限定在那些 1990 年以后才面临婚姻风险的城镇居民（即 1975 年之后出生的样本）。表 3 显示了加入住房价格后对城镇男性与女性初婚的多元分析结果。在表 3 的四个模型中，除了与房价相关的变量外，我们均加入了表 1 与表 2 中所有的变量，其效应与表 1 与表 2 中晚期出生世代的结果基本类似，出于篇幅的考虑，我们没有将这些控制变量的结果陈列在表 3 中。

表 3 房价对我国城镇居民初婚的影响^①

	男性		女性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教育年限	-.113***	-.229***	-.130***	-.174***
	(.0323)	(.0526)	(.0274)	(.0373)
市级新建商品住宅均价（单位：万元）	.360	-5.490**	-.152	-2.951*
	(.487)	(2.166)	(.404)	(1.639)
市级新建商品住宅均价*教育年限		.462***		.226*
		(.166)		(.128)
常数项	-18.905***	-18.483***	-22.267***	-22.052***
	(2.530)	(2.550)	(3.201)	(3.207)
N	3914	3914	4629	4629

注：（1）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2）* $p < 0.1$ ，** $p < 0.05$ ，*** $p < 0.01$ （双尾检验）。

为了考察住房政策的改革是否会造成房价不同地区的居民在进入初婚几率上的不同，我们首先加入了市级房价的主效应。从表 3 的模型 1 与模型 3 我们可以看出，在控制了相关的影响因素后，房价本身并没有直接影响个体的婚姻行为。因此，我们试图寻找能够在房价和婚姻形成过程中起到中介机制的变量。在表 3 的模型 2 与模型 4 中，基于模型 1 与模型 3，我们加入了房价与受访者教育年限的交互项。这时我们可以观察到，无论对于城镇男性或女性，房价与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均为正且显著，这表明教育的作用在房价不同的地区有着显著的差异。由于教育的主效应为负，所以对于交互项我们可以理解为对于我国城镇男性和女性，教育对于初婚的延迟效应随着房价的升高而

① 表 3 中对男性和女性样本我们均控制了之前在表 1 与表 2 中的全部相关变量。

逐渐变小，而当房价升高到一定程度时，教育对于进入初婚将会产生正向的效应。对于城镇男性来说，这个临界的房价为 4956 元每平方米，而对于城镇女性来说，这个临界的房价为 7699 元。

为了帮助对房价与教育的交互效应有更直观的理解，我们根据表 3 中模型 2 与模型 4 的结果绘制出图 1 和图 2 来显示在房价不同的地区，教育对我国城镇男性和女性初婚影响的差别^①。对于城镇男性，我们选择当房价分别为 2528 元（2008 年全国均价）、4956 元（临界点）、10000 元和的 14091（2008 年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均价最高<深圳市>）时绘制教育对未婚男性每年进入婚姻概率（probability）的影响。而对于城镇女性，我们选择当房价分别为 2528 元（2008 年全国均价）、7699 元（临界点）、10000 元和的 14091（2008 年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均价最高<深圳市>）时绘制教育对未婚女性每年进入婚姻概率（probability）的影响。从图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房价较低时，教育对初婚有着延迟的效应；当房价在临界点时，教育对初婚的负向效应被完全抵消，效应为 0；当房价大于临界点时，随着房价的增高，教育对初婚的促进效应也越来越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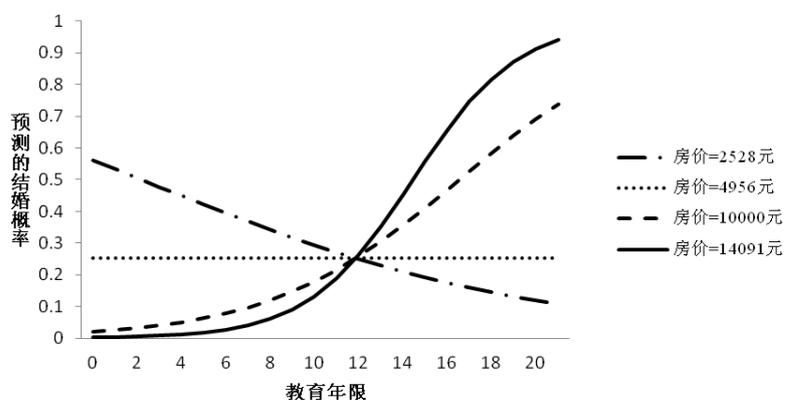


图 1 不同房价水平下教育年限对初婚概率的影响(男性)

^① 假设男性与女性都是 23 岁时，目前有工作，不在体制内工作，高中学历、不在校，拥有城市户口，非少数民族，1983 年以前出生，父亲教育程度为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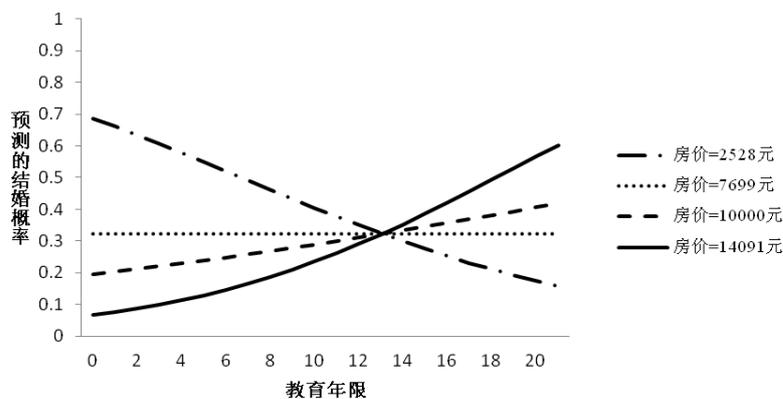


图2 不同房价水平下教育年限对初婚概率的影响(女性)

这一结果表明，住房改革确实对于我国城镇居民的初婚产生了影响，但是需要通过教育这一中介机制。也就是说，在房价较低的地区，买房相对来说负担不大，高教育者在婚姻市场上并没有显著的吸引力，许多人仍依据传统的观念尽量早地进入婚姻，但由于在校生身份与婚姻的冲突使得接受教育时间长的人往往更晚的进入婚姻，因此教育起着推迟婚姻的作用；在房价较高的地区，教育程度高的人由于具有更好的经济条件且能负担得起买房，因而在婚姻市场中更有吸引力，且这一吸引力随着房价的升高而增加，乃至能够抵消、甚至扭转教育对婚姻的延迟作用。

六、总结与讨论

进入婚姻这一重要的生命历程近年来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关注。尽管一些研究分析了女性初婚年龄的变化和某些特定的影响因素，但全面探讨初婚的决定因素和变化的实证研究仍然很少。本文对2003年和2008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城镇居民的分析正是这样一种尝试。该数据包含了详细的教育史、工作史、婚姻状况和其他相关信息，利用这一优势，我们除了能够检验我国初婚影响因素的效应之外，更能够利用时间上的变化考察特定的社会变迁对进入初婚的影响。下面我们将对主要的研究发现作进一步的总结和更深入的探讨。

本文的结果表明，我国城镇男性的经济条件尤其是就业状态对其进入初婚有着促进作用，这与以往西方的文献是一致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模式的变化，我们发现这一正向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这一变化是在变迁较为缓慢的西方社会中难以观察到的。以往的学者认为，婚姻经济基础的变化绝大部分是由女性经济角色的变化而带动的，而本研究显示，在一个变迁较为剧烈的社会中，男性的经济角色在婚姻形成过程中同样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也为理解发展中国家初婚模式的变化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其次，我们对城镇居民工作单位性质的分析发现，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体制内职工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都在逐渐下降，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企改革以及市场化的深入。以往关于我国市场转型的研究往往更多地关注个人的收入、福利等经济方面如何受到市场化影响，而本文则更进一步地探讨了经济改革对个体婚姻行为的影响。除此之外，西方文献对影响个人进入初婚的宏观因素的探讨大多局限于经济发展与女性的参工率，而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本文对体制转型的探讨引起更多学者对于特定制度变迁的关注，以在一个更全面的情境中理解个体的婚姻行为。

最后，本文还探讨了住房制度的改革对我国城镇居民初婚的影响。利用 2005 年的小普查数据，我们计算了房价与当地男女结婚年龄中位数之间的关系。^①结果显示，房价较高地区的男性与女性均往往较晚的进入婚姻，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型城市。这侧面反映出我国目前房价不断攀升对年轻一代造成的压力，也一定程度解释了为何大城市“剩男”“剩女”群体数量的增加，以及为何当前我国年轻女性在婚姻匹配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年龄较大、具有较好经济基础的配偶 (Mu & Xie, 2011)。

此外，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地区的房价也依赖个人的教育这一中介机制而对个体婚姻的形成产生作用。以往关于教育对初婚影响变化的探讨仅仅局限于其随时间所产生的变化，但是忽略了教育对初婚的作用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可能也有着不同的表现，本文正利用房价这一在时间和空间上均有不同分布的因素来考察教育对初婚影响的变化。我们的结果表明，教育对于初婚的影响除了随时间变化之外，也随着房价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效应。在房价较低的地区，教育程度

① 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在文中报告这一分析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对居民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影响较小，而高教育者由于能够承担更长的婚姻匹配时间，因此教育具有推迟婚姻的作用；但在房价较高的地区，往往只有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才有能力负担得起购买住房，因而他们在婚姻市场中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这种促进的作用往往能够抵消甚至扭转教育对婚姻带来的延迟效应，从而使得高教育对婚姻形成有着正向的作用。

综上，通过探讨我国经济转型中消费模式的变化、国企改革和住房改革这三个重要制度变迁对城镇居民初婚的影响，我们除了希望帮助人们对初婚这一重要人生历程有更深入的理解外，也期待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对婚姻家庭与社会变迁这一领域的关注。如我们所知，媒体近些年来对“剩女”、“裸婚”、“房奴”现象的关注不断升温，这反映出民众对婚姻形成和择偶条件等方面越来越高的重视。而以往学界对我国的初婚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对初婚年龄变化趋势的探讨（高颖、吴昊，2012；王跃生，2005；刘娟、赵国昌，2009），对影响初婚的个人和环境因素的研究则较少且往往基于地方数据（郑真真，2002；刘利鸽、靳小怡，2011；靳小怡等，2009），缺乏基于全国数据的对初婚影响因素全面的探讨。随着全国性调查数据的不断增加，我们期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能够结合当前社会现象，对我国民众婚姻开展更丰富、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 高颖、吴昊，2012，《人口流迁对北京市平均初婚年龄的影响》，《人口研究》第5期。
- 靳小怡、任锋、任义科、悦中山，2009，《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初婚：性别视角的研究》，《人口学刊》第4期。
- 李煜、徐安琪，2004，《择偶模式和性别偏好研究--西方理论和本土经验资料的解释》，《青年研究》第10期。
- 刘娟、赵国昌，2009，《城市两性初婚年龄模式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年度数据》，《人口与发展》第4期。
- 刘利鸽、靳小怡，2011，《社会网络视角下中国农村成年男性初婚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人口学刊》第2期。
- 王跃生，2005，《法定婚龄、政策婚龄下的民众初婚行为——立足于“五普”长表数据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 郑真真，2002，《外出经历对农村妇女初婚年龄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 Allison, Paul D. 1995, *Survival Analysis Using the SAS System: A Practical Guide*. Cary, NC: SAS Institute Inc.
- Becker, G. S. 1973, "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4).
- 1974, "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I."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2).
- 199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ian, Y. 1994,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2002,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 Bian, Y., J. R. Logan, H. Lu, Y. Pan & Y. Guan 1997, "Work Units and Housing Reform in two Chinese Cities." In E. Perry & X. Lu (eds.), *Danwei: The Chinese Work Unit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M.E. Sharpe.
- Casterline, J. B. 1994,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Asia." In T. Loech and V. H. Liège (eds.), *The Onset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Belgium: Derouaux Ordina.
- Cherlin, A. J. 1980, "Postponing Marriage: The Influence of Young Women's Work Expecta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2(2).
- Coale, A. & R. Treadway 1986, "A Summary of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Overall Fertility, Marital Fertility, and the Proportion Married in the Provinces of Europe." In A. Coale & S. Watkins(eds.),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ughlin, T. & S. Drewianka 2011, "Can Rising Inequality Explain Aggregate Trends in Marriage? Evidence from U.S. States, 1977-2005." *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11 (<https://pantherfile.uwm.edu/coughli2/www/Inequality%20and%20Marriage2.pdf>).
- Cready, C. M., M. A. Fossett & K. J. Kiecolt 1997, "Mate Availability and African American Family Structure in the U.S. Nonmetropolitan South, 1960-1990."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9(1).
- Goldscheider, F. K. & L. J. Waite 1986, "Sex Differences in the Entry into Marria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1).
- Goldstein, J. R. & C. T. Kenney 2001, "Marriage Delayed or Marriage Forgone? New Cohort Forecasts of First Marriage for U.S. Wom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4).
- Lichter, D. T., F. B. LeClere & D. K. McLaughlin 1991, "Local Marriage Markets and the Marital Behavior of Black and White Wome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4).
- Lichter, D. T., D. K. McLaughlin & D. C. Ribar 2002,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Retreat from Marriag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1(2).
- Lichter, D. T., D. K. McLaughlin, G. Kephart & D. J. Landry 1992, "Race and the Retreat from Marriage: A Shortage of Marriageable M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6).
- Logan, J. R. & Y. Bian 1993, "Inequalities in Access to Community Resources in a Chinese City."

- Social Forces* 72(2).
- MacDonald, M.M. & R.R. Rindfuss 1981, "Earnings, Relative Income, and Family Formation." *Demography* 18(2).
- McLanahan, S. & L. Casper 1995, "Growing Diversi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American Family." In R. Farley (ed.), *State of the Union: America in the 1990s, vol. 2, Social Trends*. New York: Russell Sage.
- Mu, Z. & Y. Xie 2011. "Marital Age Homogamy in China: A Reversal of Trend in the Reform Era?" *PSC Research Report* 11-742, <http://www.psc.isr.umich.edu/pubs/abs/7324>.
- Nobles, J. & A. Buttenheim 2008, "Marriage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0(4).
- Oppenheimer, V. K. 1988, "A Theory of Marriage Tim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3).
- Oppenheimer, V. K., M. Kalmijn, & N. Lim 1997, "Men'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Marriage Timing during a Period of Rising Inequality." *Demography* 34(3).
- Oppenheimer, V. K. & V. Lew 1995, "Marriage Formation in the Eighties: How Important Was Women's Economic Independence?" In K. O. Mason & A. Jensen (eds.), *Gender and Famil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 Parish, W. L. 1981, "Egalitarianism in Chinese Society." *Problems of Communism* 29.
- 1984,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J. Watson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sons, T. 1949,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Family." In Ruth Anshen (ed.), *The Family: Its Function and Destiny*. New York: Harper.
- Preston, S. H. & A. T. Richards 1975, "The Influence of Women's Work Opportunities on Marriage Rates." *Demography* 12(2).
- Qian, Zhenchao. & S. H. Preston 1993, "Changes in American Marriage, 1972 to 1987: Availability and Forces of Attraction by Age and Edu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4).
- Raymo, J. M. 2003,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he Transition to First Marriage among Japanese Women." *Demography* 40(1).
- Rosero-Bixby, L. 1996, "Nuptiality Trends and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J. M. Guzman, S. Singh, G. Rodriguez & E.A. Pantelides (eds.), *The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 Ryder, N. B. 1965, "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6).
- Sweeney, M. M. 2002, "Two Decades of Family Change: The Shifting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Marri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1).

- Tang, W. & W. L. Parish 2000, *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 The Changing Social Contra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ornton, A. & H. Lin 1994,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in Taiwa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hornton, A., W. Axinn & J. Teachman 1995, "The Influence of School Enrollment and Accumulation on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in Early Adulthoo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5).
- Thornton, A., W. Axinn & Y. Xie 2007, *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ite, L. J. & G. D. Spitze 1981, "Young Women's Transition to Marriage." *Demography* 18(4).
- Walder, A. G.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2, "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4).
- White, L. K. 1981, "A Note on Racial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Female Economic Opportunity on Marriage Rates." *Demography* 18(3).
- Whyte, M. K. & W. L. Parish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u, X. 2002, "Work Uni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Effect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Urban China." *Social Forces* 80(3).
- Xie, Y., Q. Lai & X. Wu 2009, "Danwei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Sociology of Work* 19.
- Xie, Y. & X. Wu 2008, "Danwei Profitability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95 (September).
- Xie, Y., J. Raymo, K. Goyette & A. Thornton 2003, "Economic Potential and Entry into 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 *Demography* 40(2).
- Yabiku, S.T. 2004, "Marriage Timing in Nepal: Organizational Effects and Individual Mechanisms." *Social Forces* 83(2).
- Zhu, J. 2000, "The Changing Mode of Housing Provis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Urban Affairs Review* 35(4)

作者单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於嘉）
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谢宇）
责任编辑：杨 可